

回鹘佛经翻译活动简述

牛汝极

(新疆师范大学,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本文简述了回鹘佛经翻译活动,从出土的回鹘佛教文献来看,回鹘佛教文献有四大来源,由此概述了回鹘佛经翻译的影响及思想成就。

【关键词】回鹘; 佛经翻译; 佛教

【中图分类号】H2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0X(2008)02-0045-04

第一位注意到佛教经典被翻译为回鹘语文的西方学者是法国人斯坦尼斯拉斯·于连(*Stanislas Julien*)。1849年,他在整理研究《至元法宝总录》时发现该书的前言和跋文中提及公元1285—1287年间在忽必烈汗的支持下完成了汉文《大藏经》的目录,其中谈到有回鹘文译本。^①写本还没有被世人发现,因而,回鹘文佛教文献是否存在也还只是一个假设。1907年,巴托尔德·劳费尔(*Bertold Laufer*)注意到一件吐蕃文的跋文中提及相同的佛经在元代也被翻译成回鹘文。恰巧,就在这个时候或稍前几年,吐鲁番和敦煌等地出土了成百上千的回鹘文佛教写本文献和残片,其中包括吐蕃文跋文中提及的同名回鹘文佛经。^②由此,历史上佛典的回鹘文译本的存在得以证实。随之,德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瑞典等西方列强打着“探险”、“考察”的幌子展开了一场激烈争夺西域古文献和古文物的角逐。上万件珍贵文献、文物流落异邦。

从出土的回鹘佛教文献来看,我们认为,回鹘佛教有四个来源:可能性较大的粟特佛教来源、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的吐火罗佛教来源、别什八里—吐鲁番—敦煌等地的汉地佛教来源、敦煌—和田—米兰—吐鲁番等地的藏传佛教来源。^③目前,粟特佛教对回鹘影响的假设还很难被证实,因为我们缺乏从粟特语翻译为回鹘语的佛教文献材料,也普遍缺乏回鹘早期佛教形成时期的材料。但是,至少有三方面的考虑支持粟特佛教来源这个假设:首先,回鹘文献中的基本佛教术语借自粟特语;其次,有一些回鹘佛教写本残片是用粟特文写成的;第三,粟特人的影响还可追溯到极具特色的摩尼教写作风格,这种风格肯定对回鹘早期佛教文献产生过影响。

考虑到吐火罗—回鹘的关系,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吐火罗佛教在回鹘佛教文献发展史上所起重要作用。吐火罗影响佛教徒回鹘人的最典型的证据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跋文:

洞察并深研了一切论,学过毗婆尸论的圣月菩萨大师从梵语制成了吐火罗语, *Prtarak it* (又)从婆罗米文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其中以《阿那律陀阿罗汉阿波陀那经》为名的第三卷完了。南五佛,南无法,南五僧。

毗婆尸论的圣月菩萨大师阿者梨自梵语制成了吐火罗语, *Prtanrak it* 大师(又)自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其中以《弥勒菩萨自兜率天处降世经》为名的第十卷完了。南五佛,南无法,南五僧。

将瑜伽师地等诸论区分明白的圣月菩萨大师阿者梨自梵语制成吐火罗语, *Prtarak it* 大师自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其中以《弥勒佛转发轮经》为名的第十六卷完了。南五佛,南无法,南五僧。^④

另外, 有一部吐火罗 B 种语言(龟兹语)——突厥语双语佛教赞美诗篇, 尽管其内容与摩尼教《贝叶书》(文献断代为 9 世纪末至 11 世纪初之间)有相似之处, 这一文献可以证明, 在回鹘佛经翻译活动的早期阶段, 吐火罗语为回鹘佛教徒所熟悉并使用。^⑤吐火罗影响回鹘佛教的另一个证据是回鹘使用婆罗米文情况, 目前发现至少有约 80 件婆罗米文回鹘语佛教文献和残片出自库车和吐鲁番。^⑥

从文献情况看, 汉地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最大, 汉文佛典被翻译为回鹘文的数量最多。从公元 11 世纪胜光法师(*Śīngqu Śāli Tutung*)到 13—14 世纪大批回鹘佛典翻译家参与的译经活动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回鹘文佛经。1285—1287 年间, 汉族、畏吾儿、藏族等民族高僧大德联合参加的对《大藏经》进行校勘、整理工作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大事。根据《至元法宝堪同总录》第一卷《奉诏旨编修执笔校勘译语证议诸师名衔》载, 参加此次校勘的人员一共 20 人, 其中, 回鹘人 5 位, 他们是:

“北庭都护府通二国言音, 解显密教迦鲁拿答思, 奉诏译西蕃语”。

“翰林学士嘉议大夫脱印都统, 奉诏译畏吾儿语”。

“翰林学士承旨正奉大夫安藏, 奉诏译语证议”。

“资德大夫释教都总统正宗弘教大师合台萨里, 奉诏译语证议”。

“北庭都护府通显密教、讲经论律沙门齐牙塔思, 奉诏译西天语”。^⑦

此次校勘过的经卷共 1440 部, 5586 卷。这些校勘《大藏经》的人不仅通回鹘语, 而且通汉语、藏语和梵语。汉文《大藏经》中至少经、论部分几乎都被翻译成回鹘文。汉地佛教信仰及其特点对回鹘产生了巨大影响。

蒙元时代, 藏族佛教也成为回鹘佛教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为至少有 16 部佛经是从藏语翻译为回鹘语的。元代是喇嘛教快速发展的时期, 尤其是萨迦派的发展达到了辉煌阶段。元代皈依喇嘛教的畏吾儿上层人物不少, 其中著名的有: 叶仙鼎、阿鲁浑萨里、必兰纳识里、舍蓝蓝、迦鲁纳答思、拂思吉斡节儿等,^⑧他们几乎都曾将藏语佛典翻译成回鹘语。

译经活动对回鹘佛教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来源看回鹘佛教文献情况, 可大致把回鹘佛典概括如下:

首先, 数量最大的佛典翻译来自汉文, 大约 81 部 41 种佛经。其次, 从藏语翻译过来的文献有 16 种, 其中, 密宗文献 14 种, 大乘文献 1 种, 论部 1 种。第三, 译自吐火罗语佛典文献可以肯定至少三种: 《十业道譬喻鬘经》、《阿兰弥本生故事》和《弥勒会见记》(也称《弥勒三弥底经》)。此外, 有 9 种译自梵文, 3 种为回鹘人自己写作的作品, 遗憾的是, 另有至少 9 种回鹘语佛教文献目前还无法判定其来源。^⑨

绝大多数回鹘语佛教译本和抄本的准确年代还很难确定。^⑩回鹘佛典的翻译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森安孝夫认为, 早期阶段大致界定在从公元 10 世纪的最后 10 年到 11 世纪的最初 10 年之间, 当时的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原有的传统, 其中包括伦敦所藏《八阳神咒经》卷子、《弥勒会见记》、《善恶两王子故事》、《阿兰弥本生故事》、《十业道譬喻鬘经》、藏文回鹘语残卷《佛教教理问答》、伦敦残卷《观无量寿经》、柏林藏《妙法莲华经》残片等;^⑪第二阶段是从 11 世纪到 13 世纪, 几乎所有文献都译自汉文; 最后阶段恰好在蒙元时期, 即公元 13—14 世纪, 这个时期有不少藏传佛教文献被翻译成回鹘语而且出现雕版和活字印刷品。

我们对绝大多数回鹘佛典的翻译者都是不清楚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别什八里学者和翻译家胜光萨里都统(*Śīngqu Śāli Tutung*) 法师, 他曾先后翻译了《金光明经》、《玄奘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 而且可能还翻译了《八阳神咒经》和《妙法莲花经玄赞》等。^⑫另一位回鹘佛典翻译家名为 *Praññaraksita* (回鹘文记作 *Prtanraksit* 或 *Prtarakṣit*), 他曾将《弥勒会见记》从吐火罗语翻译为回鹘语, 上文所引三则《弥勒会见记》跋文就提及此人的功绩。有两位 13 世纪的回鹘佛典翻译家: 一是

别什八里人安藏,他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和《普贤菩萨行愿赞》;一是昆尊萨里都统(*Küntün Šāli Tutung*)法师,他翻译了《慈悲道场忏法》。已知的其他一些藏传佛教翻译家及其活动多限于 14 世纪,如:笨雅失里(*Punyasri*) 在 14 世纪 30 年代从藏文翻译了《转轮王曼荼罗》、《秘密集会坦特罗》等文献;桑伽失里(*Samghasri*)法师翻译了《胜军王问经》和《文殊师利成就法》;迦鲁纳答思(*Karunadasas*) 在 1302 年翻译了《文殊所说最圣名义经》;哈密人阿利雅—阿恰利雅(*Arya Acarya*) 翻译了《那罗巴之死亡书》等。

回鹘佛教思想的主要宗派在 10 世纪末还很难判定,尽管我们知道大量本生故事的翻译成为这种新的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种翻译活动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他们完善了其原始佛教思想并有助于塔里木盆地居民的听众对佛教的理解和认识。^⑬从戒律方面也不能概括出作为佛教徒的回鹘人有佛教附属宗派组织的存在,虽然回鹘文佛教残片中使用了一切有部和一切有根本的戒律。然而,到了蒙元时期,回鹘人中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宗派之一大概就是净土宗了,在整个蒙元时期它都影响着回鹘人。这可以从回鹘人翻译《观无量寿经》、大小《无量寿经》、《大乘无量寿经》和其他文献中看出。

《阿弥陀经》反映了白莲社宗的影响。一些回鹘文禅宗文献说明 11 世纪之后禅宗佛教在回鹘人中盛行的状况。^⑭此外,到了 13 世纪,回鹘人中出现了华严宗尤其在翰林院士安藏法师的著作(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和《普贤菩萨行愿赞》)中反映的尤为突出。汉地佛教的影响在蒙元时代以前明显地没有受到大的挑战,当时,藏传佛教的影响开始在回鹘人中接触,很快,不同藏传佛教宗派全面控制了回鹘王国。

从来源上看,回鹘语大藏经有翻译佛典和改编撰述两类。翻译作品有直译、意译、摘译等。回鹘语佛典翻译以回鹘文为主,多译自汉文和吐火罗文;回鹘语婆罗米文文献,多译自吐火罗文和梵文;回鹘语藏文佛典多译自藏文;此外,回鹘人在佛典翻译中还大量使用了汉字和粟特语词汇。这些情况反映了回鹘佛教的不同来源:吐火罗佛教、汉地佛教、粟特佛教和藏传佛教。改编撰述的佛教文献为回鹘人或据佛典原本改写,或对经、律、论的疏证,这类回鹘语佛教文献不多。

从结构体系上看,目前虽未发现一部完整的回鹘语大藏经,^⑮但从保存下来的回鹘语佛教文献来看,几乎大藏经中各部均有回鹘语译本。有些回鹘语佛典不见于汉文或其他文本的大藏经中,如:《弥勒会见记》、《因萨蒂经》、《阿兰弥王本生故事》、《十方平安经》等,是回鹘人对中国和中亚佛教史的贡献。

注 释:

① 参见 Stanislas Julien, *Concordance sinico-sanskrite d'un nombre considerable de titres d'ouvrages bouddhiques recueilli dans un catalogue chinois de l'an 1306*, JA 14 (1849): 366-367.

② 见 Johan Elerskog, *Silk Road Studies I: Uyghur Buddhist Literature*, Brepols 1997, Turnhout, 1-154, p. 7-9. 本文是在拙著《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一书第 6 章《回鹘文佛典集解》(第 177-222 页)的基础上重点参考了此书内容完成的,下文不再一一注出,特此说明。

③ Johan Elerskog 认为,回鹘佛教有三个来源:粟特、吐火罗和汉地佛教,参见其 *Silk Road Studies I: Uyghur Buddhist Literature*, Brepols 1997, Turnhout, p. 8.

④ 参见李经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勒经》初探”,《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1 期(1-36 页),第 4 页。本文在引用第一条及下面两条跋文时对个别地方作了修正,下面不再一一注出。

⑤ Larry Clark, "The Manichean Turkic Pothi-Book," 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 卷 9 (1982): 160; Peter Zieme, *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91): 21-23, 34-35.

- ⑥ Dieter Maue,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I: Dokumente in Brahmi und Tibetischer Schrift*,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1996, 1-166, Tafeln 1-102.
- ⑦ 见《大藏经》目录部, 总 19 部 174 卷。
- ⑧ 参见张羽新的《元代维吾尔族喇嘛僧》(《中国藏学》1996 年第 2 期)以及尹伟先的《维吾尔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别卷 1.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第 197-211 页)。
- ⑨ Johan Elerskog, *Silk Road Studies I: Uyghur Buddhist Literature*, Brepols 1997, Turnhout, 1-154, p. 10.
- ⑩ Gerhard Doerfer, "Bemerkungen zur chronologischen Klassifikation des [literen T'ürkischen]," *AoF* 18,1(1991): 170-186. Gerhard Doerfer, *Versuch einer linguistischen Datierung älterer osttürkischer Texte*. Wei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3, Marcel Erdal, "The Chron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Old Turkish Texts," *CAJ* 23(1979): 151-175. Peter Zieme, "Bemerkungen zur Datierung uigurischer Blöcdrucke," *JA* 269(1981): 385-399. James Hamilton, "On the dating of the Old Turkish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R.E. Emmerick, Werner Sundermann, Ingrid Warnke and Peter Zieme, Ed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6): 135-145.
- ⑪ Moriyasu Takao, "L'origine du bouddhisme chez les Turcs et l'apparition des textes bouddhiques en turc ancien," *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entrale.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Japonais*. Haneda Akira, Ed. Kyoto: Dōhōsha (1990): 147-165, (pp.150-151).
- ⑫ Şinasi Tekin, "Uygur Bilini Singku Seli Tutung'un Bilimeyen Yeni Bir Çevirisi Üzerine." *TDAYB* (1965): 29-33. Peter Zieme, "Singqu Sāli Tutung-Übersetzer buddhistischer Schriften ins Uigurische." *Tractata Altaica* Denis Sinor sexagenario ...dedicata. Walther Heissig et al., Ed.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 7657-773. James Hamilton, "Les titres šāli et tutung en ou]gour," *JA* 272 (1984): 425-437. Kahar Barat, "++ingqo ++āli Tutung, traducteur du Sākiz yükmāk yaruq nom?" *JA* 278 (1990): 155-166.
- ⑬ Annemarie von Gabain, "Die alttürkische Literatur," *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 II*. Louis Bazain et al.,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64): 211-243, (p.224).
- ⑭ 除了《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和《观身心经》(Xin tözin uqitdač nom) 之外, John R. McRae 曾经指出有《观心经》的回鹘文译本, 参见: *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325, n.159. 另参见: Peter Zieme, "The Sutra of Complete Enlightenment' In Old Turkish Buddhism,"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 The Sources of Chinese Buddhism*. John R. Mcae and Jan Nattier, Eds.
- ⑮ 据耿世民介绍, 传说西藏的萨伽寺存有全套的回鹘文大藏经, 可惜一直未能证实。见耿世民: "谈维吾尔佛典", 载: 李铮、蒋忠新编《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553 页。

参考文献:

- [1] Moriyasu Takao, "L'origine du bouddhisme chez les Turcs et l'apparition des textes bouddhiques en turc ancien," *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entrale.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Japonais*. Haneda Akira, Ed. Kyoto: Dōhōsha (1990).
- [2] 尹伟先. 维吾尔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别卷 1) [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 [3] 牛汝极. 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 [4] 牛汝极. 回鹘佛教文献 [M].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

作者简介:

牛汝极, 男, 汉族, 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 新疆语言文化和民族问题研究。